

# 陶行知学生自治目标与实施思想述评

严淑贞<sup>1</sup>, 涂怀京<sup>2</sup>, 马洪骄<sup>2</sup>

(1. 三明学院教育与音乐学院, 福建 三明 365004; 2.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福州 350007)

**摘要:**陶行知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创建了“生活教育”学说, 学生自治思想是该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含学生自治的基点、学生自治的目标和学生自治的实施。陶行知认为立于学生自治的基点, 学生自治的目标在于学生养成“对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才力”, 学生自治的实施在于将其“当件大事做”“必须办到一个地位”。陶行知的学生自治目标和实施的思想, 推动了民国时期的学生自治运动和新教育改进潮流。

**关键词:**陶行知; 学生自治; 自治目标; 自治实施; 教育主张

## A Review on Students Autonomy Goals and Implementation Thoughts in 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YAN Shuzhen<sup>1</sup>, TU Huaijing<sup>2</sup>, MA Hongjiao<sup>2</sup>

(1.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Music, Sanming University, Sanming, Fujian 365004;

2. College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Abstract:** Tao Xingzhi founded the theory of life education rooted in the soil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idea of student autonom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eory, including the basis of student autonomy, the goal of student autonom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udent autonomy. Tao Xingzhi believes that the goal of student autonomy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llingness, intelligence and talent for public affai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udent autonomy lies in making it “a big thing to do” and “must be done in a position”. Tao Xingzhi's goal of student autonomy and the idea of implementation promoted the student autonomy movement and the trend of new education improvemen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era.

**Keywords:** Tao Xingzhi; student autonomy; autonomy goals; autonomous implementation; educational propositions

### 一、陶行知学生自治思想概述

民国时期, 很多学者提倡“学生自治”, 如蒋梦麟提出“政治因尊重个人, 故曰共和, 曰民权; 教育因尊重个人,

【收稿日期】 2025-03-10

【作者简介】 严淑贞, 教育学硕士, 三明学院教育与音乐学院辅导员; 涂怀京, 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福建省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访学研究员; 马洪骄,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故曰自动,曰自治”,蔡元培强调“共和国民以自治为天职”故教育须养成学生自治之品性。学生自治思想也是陶行知所创“生活教育”学说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学生自治的基点、学生自治的目标和学生自治的实施等关键维度。陶行知指出,学生乃将来之公民,“学生自治是学生结起团体来”“使学生能够组织起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sup>[1]</sup>此即为陶行知学生自治基点的主张,包含道德自治能力、循法自治能力、学问自治能力、康健自治能力四个方向。

本文拟探讨陶行知学生自治的目标和学生自治的实施这两个向度上的思想。在亲掌和任教的南京高师、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等教育机构,陶行知在不断开辟的各项教育教学、管理服务事项中,坚持开展、丰厚学生自治目标和实施问题的理论建构及实践推进。

## 二、陶行知论学生自治的目标:养成“对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才力”

陶行知要求学生掌握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但绝不是“自顾自”“关起门”的修齐功夫。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一文阐述“学生自治”要义时即提出,“学生自治”的“学生”指的是全校的同学,要求学生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共同制订、遵守一个共有的、有规律的、有秩序的集体生活准则,并以此为共同活动、学习、生活的依据,助长团体生活的精神,锻炼共同自治的能力。促使学生借此养成几种主要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能够具备主动的行为,即致力于公共幸福的愿力;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即担负公共事业的智力;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即判断公共是非的才力。简言之,陶行知学生自治的目标是“养成我们对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才力”。<sup>[2]</sup>

### (一)养成致力公共幸福的愿力

#### 1. 服务民众的浓厚艺术兴趣

陶行知在创建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之时,提出“艺术的兴趣”的教育目标,要求晓庄师生能够自觉地以艺术的眼光去欣赏、改造农村的事物、环境,以愉悦的心情对待农村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忍受乡下之苦,欣赏乡村之乐,从而增长改造乡村的愿力。陶行知将学校场地定在南京郊外的劳山脚下,“背靠幕府山,山下是滚滚的长江;面临紫金山,山上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周围是农田连片,菜花飘香。”<sup>[3]</sup>在给操震球的《乡下生活之苦乐》介绍信中,陶行知描述晓庄的山清水秀之景象,早可见旭日东升,晚可待月沉西归,收成时可获黄金似的稻谷,田家乐的山歌不断的洋洋乎盈耳。<sup>[4]</sup>体现出陶行知对晓庄师范学校选址的重视,通过选择怡人的乡村环境,感化、教育新一代的乡村教师。

学校环境的改造是学校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教育的一部分。陶行知提出“全校师生应以美术的精神共同改造学校环境”。<sup>[5]</sup>为了与农村生活环境相协调,晓庄学校的建筑都以茅草屋为主,陶行知还聘请设计师朱葆初绘制图样,为不同的建筑题名。女生宿舍称为“桃花村”,陶行知自己的住所题名“五柳村”,图书馆又名“书呆子莫来馆”,皆具娱乐和艺术意味,以熏陶和培养学生“艺术的兴趣”。陶行知专门聘请美术指导员赵颜如、许士骥以及音乐指导员陈静山,对学生的艺术课程进行指导。在王宜早的《晓庄文存艺术卷》中,收集了晓庄师生的艺术作品,包含国画、油画、剪纸、水彩等。晓庄的艺术生活还有唱歌,在每日“寅会”之前要吟唱《锄头歌》《自立歌》《村魂歌》《镰刀歌》等,其中《锄头歌》是晓庄的校歌。学校举行的联村运动会包含“锄头舞、蓑衣舞、插秧舞、骑牛”等表演,参与的不仅有晓庄的师生,还有乡村的农夫,诸多节目均结合实际生活,展现乡间风味。

陶行知认为,晓庄剧社能够让师生借公演的需要,让音乐、文学、国语等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前进。乡村的文艺演出还能吸引因乡村生活乏味而沉浸于赌场烟馆的民众,使他们通过正当的艺术娱乐戒掉喝酒、赌钱等消颓之气。陶行知曾言“要有化社会的能力,先要情愿社会化”,<sup>[5]</sup>正是由于这种“艺术兴味”的培养,使得晓庄师生能够乐

以忘忧,自动自觉地提高化社会的愿力与能力,使师生能够从远处着眼、从近处着手,怀揣艺术的精神改造学校环境,投身乡村建设。

## 2. 具备改造社会的精神

陶行知重视“自我管理”的自治方法,但这种自管、自治的路径并非只顾己身,而要以公共幸福为目标。这种个人提升与公共事业的联合,便是以养成“改造社会的精神”作为二者沟通的桥梁。在一次湘湖“教学做”讨论会中,陶行知表达了何为“改造社会的精神”:乡村教师或未来的乡村教师,心中应当有一个“理想的社会”“假使理想社会里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即要运用教育的力量去改变它。至于优良的,虽在这社会之外,也要把它吸进来”。<sup>[6]</sup>这种精神在当时国民智识程度普遍低下、城乡师资严重不平衡的情境中显得尤为重要,它能作为乡村教师扎根农村生活的精神支柱,也能成为推动师范生踏入未知边疆的重要力量。改造社会的精神与陶行知多次批判的“守知奴”相反,是对“守知奴”的一剂矫正之方,能鼓舞大众投身于普及教育、改造社会的公共事业中,砥砺他们致力公共幸福的愿力。如何养成“改造社会的精神”?陶行知在撰写的《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一文中,提出乡村改造要在“自然、社会里的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师范学校,活的师范学校产生活的教师,活的教师产生有生活力的国民”,<sup>[7]</sup>尽显“产生”“改造”的意味,这一过程既指向改造社会的目标,又达成了“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愿望。

改造社会的内容是丰富的,具体须以农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主,以服务公共事业、提升公共幸福为核心。陶行知提出乡村生活教育的五个目标,即培养“康健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sup>[8]</sup>“改造社会的精神”既属于其中的同级目标之一,又可抽离成为前四种目标、内容的重要手段。陶行知以“改造社会的精神”培养师范生,再由师范生到中心小学、中心幼稚园,把中心学校变成发电机和“活的电线”,紧密连接了学校和社会,再由中心学校的学生“拿电力送到农家去,使家家发出光明来”<sup>[9]</sup>。培养“艺术的兴趣”要求晓庄师范生自觉地以艺术的眼光去欣赏、研究、改造农村的事物与环境,获取行动和艺术的力量,乐以忘忧、临难不恐。

## 3. 心怀在穷国普及教育的志向

山海工学团时期,陶行知打造了“小先生制”这把“穷国普及教育的钥匙”,他将中国乡村视为新教育之“新大陆”及“工学团最好的育苗场”,教育者将种子遍撒至育苗场中,生出“中华民族的新生命”,也连带培养了园丁,即小先生<sup>[10]</sup>。一个苗圃培养一批园丁,再由这些园丁带着幼苗到处栽培,使它繁殖到天海尽头。在陶行知看来,山海工学团实行“小先生制”,是要培养小先生改造社会的精神,亦是让其负担起普及教育的责任。他称“小先生制”为“细胞分裂法”,<sup>[11]</sup>以一教二、二教四的分裂方式,直至将教育传递至各个角落,实现教育普及、乡村改造的目的。对于怎样指导小先生,陶行知总结了五条方法,即“非班级常规、开起门教人、即知即传、与生活连在一起、要有指导和考核”<sup>[12]</sup>,要以指导和考核的方式训练、检验小先生,每个小先生担任两三个人的教育任务,坚持“开起门教人”的原则,不做“守知奴”,突破学校的围墙,将学校与社会化作一处,将生活与教育融为一体,以一种众人联合推进的力量,自动普及教育,实现乡村振兴。

陶行知以“小先生制”为普及教育的方式方法,该举措“如一条条血管,将学校与社会连接起来,充分发挥这一新型的文化细胞在整个社会文化网络中的作用”。<sup>[13]</sup>至此,不论是普及生产教育、科学教育、自卫教育、交通教育还是艺术教育、健康教育、共济教育,都能通过小先生制来实施。

### (二)养成负担公共事业的智力

在不同的“生活教育”实验期,陶行知都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不断提高学习力才能具备担起公共事业的能力。他在晓庄学校提出要培养师范生“科学的头脑”,在工学团提出要“学以明生”,在育才学校提出“迷

悟爱”,均指向如何“养成负担公共事业的智力”之切实路径。

### 1. “科学的头脑”

戴伯韬认为陶行知知读书、研究学问,“都抱着一个目的,问一问,这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人民和民族的灾难吗?”<sup>[14]</sup>确实,陶行知提高学生的学问、科学水平,也首先是为了他们具备担负公共事业的智力,进而去直面、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去为人民服务。在晓庄师范学校,陶行知提出以培养“科学的头脑”和“农人的身手”来弥合“劳心”与“劳力”的分离,消除“劳心者”思想不能印证于经验以致秀而不实、“劳力者”囿于琐屑故常以致无法创新的弊端。他主张“农人身手”与“科学头脑”相结合,使学生和农民都能“在劳力上劳心”,能“从时代车轮底下爬起来做机器的主人,不做机器的奴隶;运用科学,征服自然,做自然界的主人”。<sup>[15]</sup>陶行知指出科学头脑的培养过程,是引导受教育者“运用科学方法,在做上追求做之所以然,并发现比现在可以做得好一些的道理”,<sup>[16]</sup>培养其科学试验的自治能力,能够“行动生困难,困难生疑问,疑问生假设,假设生试验,试验生断语,断语又生行动”,能够以行动为思想的母亲,“行动一下,反思一下,再反思一下,如此演进于无穷”,<sup>[17]</sup>通过不断地尝试和试验去探寻真知、发明新理。为此,晓庄筹建了“科学馆”,开设了“中心木匠店”“农艺陈列馆”,扩大了科学知识的传授范围和途径,突破了束缚旧式劳心、劳力者的桎梏,让科学头脑和精神的培养落到了实处。

### 2. “学以明生”

陶行知曾指出,农业、工业不重师重学,则“农必破产”“工必粗陋”。在《如何达到工以养生》一文中,陶行知以种植棉花为例,鼓励人们自觉地汲取科学知识,促进乡村事业的振兴与发展。而重师首在师之自重,要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乡村教师首应具备相当学识和愿力,要把头顶的博士帽、硕士帽、学士帽去掉,把相比百工高一个头的野心去掉,把一双可以自由活动的手伸出来,“士”化为“工”,教人做实验之工,做生产之工,做建设之工,做创造新农村、新中国、新世界之工。这样,知识分子变为农人,农人变为知识分子,最后变成同一分子。在山海工试验中,陶行知以“工读结合”“在劳力上劳心”为其主要的学习方式,不论是木工、袜工、藤工,还是种菜、养蜂、养兔等农副业生产,都要求将劳力与劳心相结合,请相关的教师或师傅传授文化知识和技能,传授者也可向经验丰富的工农民众学习实践知识,取长补短、相互裨益。这就实现了山海工学团独特的教学情境,如“上午学习文化、科学、政治方面的课程,下午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实行半工半读”<sup>[18]</sup>。陶行知还专门做了首《工师歌》:“他是木匠,我是先生,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他哼成了木匠先生。”<sup>[19]</sup>

### 3. “迷悟爱”

在育才学校,陶行知提出的《育才三方针》为“迷、悟、爱”。<sup>[20]</sup>“迷”强调学生的兴趣、天性是学生学习的起点和关键点,教师要做的便是创造使学生“迷在某种特殊活动”的条件<sup>[20]</sup>,使学生能自动自觉地投入学习活动中。此前的工学团时期,陶行知每逢星期三就在广播中播放一首歌,一星期轮换一首,歌词固定在星期二的《新夜报》上发出,通过小先生们预先将歌词教给他人,待次日播音时,大家便能温习、加深对歌词的识记,提升对识字读书的趣味。“悟”,即要在学生“迷”的前提下,依据启发式教学指导学生对所“迷”的活动取得更深的了解,使其获得广阔无垠的知识。这种启发方法着重使学生产生疑问、产生解决问题的自觉性。

陶行知主张,“悟”的目标是要指导学生“对人生各方面的关系和宇宙人类历史的发展取得更广的认识”,<sup>[20]</sup>重在学生对未知的挖掘,而非局限于学校教师所传授的部分。育才学校尤为注重学生“文化之工具”的获得,包含“语言、文字、图画、数字、逻辑”这五项,陶行知认为只有获得了这五项工具,才可以追求高深的学问、治繁杂的事,自动地吸收广泛的知识。<sup>[21]</sup>

“爱”则是要通过集体生活的培养,引发出学生对民族人类更高的自觉的爱。<sup>[20]</sup>陶行知在《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中提出“集体生活是全盘教育的基础”,<sup>[22]</sup>集体教育是儿童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陶行知

将儿童视为民族未来的巨子,倾心培养了一批批“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小先生又自动地以知识技艺之长去帮助工友、同学及学校附近农友。陶行知所提出的“迷悟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构成一整个学习的链条。

### (三)养成判断公共是非的才力

知所不豫,行且通焉。面对当时中国教育存在“死读书”“读死书”的沉痾宿疾,陶行知呼吁增强教育的生活性、实践性和时代性,造就具有真才实学的新一代青年。养成学生致力于公共幸福的愿力和负担公共事业的智力,不能不结合实际生活中各种“生活力”“常能”的锻炼,即不能不结合培养学生判断公共是非的才力,以据此服务多元社会,改良实际生活。

#### 1. “三千种生活力”

陶行知指出,中国教育的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这种“无能的教育”是“亡国的催命符”<sup>[23]</sup>。因此,改革这种教育的对策是“手脑联盟”,以“教学做合一”的方法破除“双料小姐”和“双料少爷”的教育,改变“留声机器”“字纸篓制造厂”的教育,而代之以“在劳力上劳心”的新教育。陶行知撰文《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将个体的全部生活划分为康健、劳动、科学、艺术及社会改造五种生活,详细列举了七十种“生活力”,并断言个人成长过程中至少需养成三千种以上的“生活力”。如为了达成“农人身手”的培养目标,学校应以“生活即教育”为原则,以“过劳动的生活便是受劳动的教育”为指导<sup>[23]</sup>,晓庄学校的劳动教育亦是在劳动的生活中传授,包含种植菜、树、麦,以及养鸡、养鸟、养鱼、扫地、织布等事宜。晓庄规定解除一切服侍师生、妨碍师生自己主动做事的“听差、斋夫、老妈子”,<sup>[24]</sup>只雇用了一名担任挑水、烧锅事务的校工,而剩余的事务都列为学生的正课,“不会种菜不算学生”“不会烧饭不得毕业”,<sup>[25]</sup>使得师范生在乡间有其用武之地,能够“谋手脑相长,增进自立能力”,<sup>[26]</sup>具备判断、担扛公共事务的才力,为乡村改造做实际的贡献。

#### 2. “二十三常能”

“常能”一词提出于陶行知筹建晓庄师范时期,他在参观江宁县立师范学校时看到该校将《捕蛇者说》《中国农业历史》纳入课程,教师与学生一同做饭煮菜,学习日常生活必需的技能,称赞这种不忘教授“日用的常识常能”的学校是全国乡村生活改造事业的希望,是“天将明之师范学校”。<sup>[27]</sup>晓庄时期的“三千种生活力”,与育才时期的“二十三常能”,二者有相通之处,都旨在个体充分具备日常生活的能力。后者结合了育才集体自治生活的需要,主要聚焦于会当书记、做小先生、参加开会、说国语、应对进退、管账目、管图书、查字典、布置、修理、种园、烧饭菜、洗补衣服、游泳、急救、唱歌十六项初级常能,以及会开汽车、会打字、会速记、会接电、会临时讲演、会担任翻译、会领导工作等七项高级常能,<sup>[28]</sup>是“三千种生活力”基础上的重要延伸和补充,共同构成了养成学生判断公共是非的“才力”的重要内容。

## 三、陶行知论学生自治的实施:“当件大事做”“必须办到一个地位”

学生自治是学生在学校与社会练习自我管理的过程,也是成为合格的共和国国民的“必修课”之一。而其实施若要达成预期的效果,则需将学生自治“当件大事做”“当个学问研究”,<sup>[29]</sup>办到一个地位,方可以进步,方可使参与者和旁观的人都不得不欣赏。

### (一)把学生自治当大事做、当学问研究

#### 1. “当件大事做”

1919年的《新教育》杂志,刊发了包括陶行知《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在内的三篇学生自治的文章。《教育与职业》《学生杂志》等也相继刊发相关的文章,学生自治成为国内学者热议的话题。在陶行知看来,学生自治不仅需要全体学生的认真浸染和践行,学校和教育当局亦应以一种信仰心和荣誉感,将学生自治当作一件大事来看待。

陶行知曾言,“要提高学生自治的价值,就须使最好的领袖不得不出来服务”,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说得小些,他关系千万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陶行知在领导晓庄、育才等学校时,恪守学生自治理念,莫不主动地实验、示范学生自治,且常深刻反思不到位之处:“我这个区区的校长也不是例外,常常不知不觉地独断独行,违反了民主的精神。”<sup>[30]</sup>

陶行知秉持“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使命感,重视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进学生自治。在晓庄的自治实践中,陶行知坚持“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以全校包括校长、教师、校工在内所有成员参与学生自治组织之中,共同制定、遵守自治的准则。将学生自治由学生群体扩大至整个学校成员的范围,营造了更为浓郁良好的学生自治氛围。如晓庄“教育先锋团”定有团规,陶行知身为校长也严格遵守团规各项条款。俞子夷回忆道,“某次赴宁出席一会议,陶亦在。下午,陶频频看手表,不及终会先退,谓校内规定几点钟必回校,迟返者罚坐暗室云”。<sup>[31]</sup>陶行知先后创建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民众学校、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验基地,都将学生自治当作要务来看、来做,不仅要求农民、工人、平民家庭的学生和小孩都能学会自治自立,富裕家庭的小姐、少爷也要学会自治,学习如何做事当家。陶行知始终把学生自治“当件大事做”,<sup>[29]</sup>在育才学校拟定《育才学校公约草案》,制定了甚为完备的学生自治组织体系,以期通过学生自治来推进立体周贯的教育,“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sup>[32]</sup>

## 2. “当个学问研究”

回溯学生自治之源头,于西方可前溯至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学生治校”,后经由“洪堡理念”与“美国教改”的影响得以接续;于中国可从官学的“斋长制”和书院的“高足弟子代管制”中寻得相通之处。<sup>[33]</sup>但如一味照搬、照用,都不外乎是“仪型外国”或“沿袭陈法”。陶行知回国初任南高师教授,撰《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反对这两种做法,主张“试验者,发明之利器也”,<sup>[34]</sup>强调要以试验主义的精神,将学生自治当一个学问来研究,研究学生自治需注意“同学的切磋”,即要让学生在自治的实践中,增长自治的经验,领悟自治的知识,引发对于学生自治的创新想法;“教员的指导”,即把“立国根本”的学生自治置于学校其他功课同等的地位,既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也需要教职员的指导。

针对少有教职员潜心研究学生自治问题的情况,陶行知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校方应物色富有共和思想与自治精神的教师任职;二是组织教师与学员共同研究自治。陶行知提倡师生共学、共事、共同研究自治议题,认为教与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教师并非只是教授,亦需学习,教师在指导学生自治的同时也能探得更多的自治知识和更新的自治理念。

晓庄师范学校学生李楚材曾生动描绘学校的学习与生活,著成《破晓》一书,被陶行知称为“是楚才在晓庄摸黑路之自述”“是楚才和他的伙伴在晓庄所过生活之写真”。<sup>[35]</sup>孙铭勋和戴自俺合编的《晓庄批判》,汇集了各地来晓庄参观者所做的演讲或文章。晓庄教师杨效春编著的《晓庄一岁》,通过设问的形式回答了当时学界或亲来参观者对于晓庄的种种提问。这些书籍及孙铭勋的《古庙活菩萨》、程本海的《在晓庄》、方与严的《晓庄之一页》、胡同炳的《南京儿童自动学校十年努力记》、马侣贤和戴自俺的《山海工学团》,从多侧面叙述了陶行知在晓庄等学校的长期探索试验,更是陶行知及他领导下的师生共同把学生自治视为一个学问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出实践硕果的生动写照。

## (二)把学生自治办到一个地位、有人欣赏

### 1. 办到一个地位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sup>[36]</sup>陶行知怀揣坚定的信念投身于教育实践,致力于培植学生自治能力这个大且有其地位的教育实务,冀望立于教育民主科学化之基推动国家的发展进步。陶行知曾批评当时的教育

只会让人离开乡下向往城市,只会造成吃饭者与种稻者、穿衣者与种棉者的两相分化,只会教人分利不生利、教强的变弱、弱的格外弱,只会教勤的变惰、惰的格外惰。<sup>[37]</sup>陶行知倾心致力的是生利的、建设的、救国的教育,是要觉醒学员和民众的头脑,鼓舞他们起来做主人,去谋求解放和创造,“为中国一百万个乡村创造一个新生命,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新生命”。<sup>[37]</sup>陶行知的学生自治教育的最终旨归是要引导生活力、创造力、学习力,使其达到更好的、持久的效果。<sup>[38]</sup>

## 2. 办到有人欣赏

陶行知苦心孤诣地要将学生自治办到“使人不得不欣赏”的地位,使“凡参与和旁观的人,都觉得他宝贵,都不得不欣赏他,爱慕他”<sup>[39]</sup>。陶行知创办晓庄开始推进学生自治试验的整个过程中,做到了不仅让参与其中的指导员、师范生觉得它宝贵,也引来国内乃至国际著名教育人士的参观和赞赏,一时备受瞩目。1927年10月,蔡元培参观晓庄师范学校后,称晓庄式的人才培养办法实乃“现代教育方法中最好的一种”。<sup>[40]</sup>同年11月,国际自由平等同盟会代表来华参观晓庄师范学校,感慨其办学宗旨和方法推翻了旧式教育制度,为中国创造了一种新式教育制度,“实在很适合现代潮流”“是很可祝贺的”。<sup>[41]</sup>梁漱溟考察了晓庄的教育实验,同样持赞赏的态度,对以学生自我管理、教师负责监督和顾问的学生自治思想尤为推崇,放言晓庄的做法为中国的教育“找到了一条付诸实现的途径”<sup>[42]</sup>。克伯屈称赞晓庄学校是他这几年天天所思慕、希望看到的一所学校,“完全合乎现代的思潮”,应将其“普遍地传布到全国去,教全国采取适合乡村需要的教育,变动他们的生活”。<sup>[43]</sup>克伯屈还提出将晓庄生活的照片和说明装订成书,带去美国的学校,也寻一所美国学校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交流从而“发动两国文化上的交换”。<sup>[44]</sup>

浙江省第三大学区主任委员蒋梦麟偕同沈定一等参观晓庄学校后,甚为欣赏,表示浙江要筹办一所省立乡村师范学校,请陶校长推选三名学生前去协办。<sup>[45]</sup>不久,陶行知便指派操震球、王琳和程本海前往杭州,最后在杭州闻家堰、湘湖农场附近建筑校舍,开办了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学校。而后又派方与严、李楚材二人前往任教,带动了湘湖乡村师范学校的各项工作,标志着晓庄师范“其规模流传全国”的全面开启。<sup>[46]</sup>王秀南在《介绍革命的晓庄学校》中,称赞晓庄学校民主管理方式的同时,也对晓庄感到疑惑:“为什么各地学校,时常得闹乱子,独于晓庄学校,则处于泰然”;“为什么各地学生,多吹毛求疵,攻击他们学校的坏处,独于晓庄学生,不但不加破坏,而反替他们学校宣传”。<sup>[47]</sup>其原因、其源头,无疑地就在于陶行知在所掌学校抛弃了传统僵化的训育制度,将学生自治、民主治校、凝心聚力发展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 3. 把个人自治推进到集体自治

教育民主和平等是陶行知学生自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他曾发文指出“平等互助”为中华民族及教育之出路,“不但我们民族的出路是平等的互助,即世界人类的出路,也在平等的互助”。<sup>[48]</sup>因此学生自治不能只局限于个人、小我的自我管理和完善,而应在共同自治的实践中,坚持“人中人”的理念,在练习自治的同时学会做“人中人”而非“人上人”“人下人”<sup>[49]</sup>。陶行知在组织学生自治实践的过程中,注重全方位地将个人自治推进到集体自治,实现学生群体的集体自治,且更为注重将不同角色、身份的人加入集体自治的范围中。如在晓庄师范的教育实践中,这种集体自治的范围就包括了学生、教师、校领导、校工;在山海工学团,又将工人团体纳入其中,使知识分子与劳工群众相结合,认为工学结合之时,团结亦是要紧之事。陶行知不断扩充集体自治的内容和范围,所瞄准的正是要将学生自治推向整个民族国家的自治、民主和进步。

育才学校的校徽是一个“三圆圈”图案,“圈”具备三种德行:一是虚心,代表学习;二是不断,代表工作;三是精诚团结,代表最后胜利。三个圆圈分别代表着“全校一体”“世界一体”“古往今来一体”。<sup>[50]</sup>还包括其他更多的三维意义,如民族、民权、民生;智、仁、勇;工、学、团;自然、劳动、社会等。陶行知强调,育才学校的集体生活“是儿童

之自我向社会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儿童心理正常发展所必需”,<sup>[51]</sup>他所设计的不仅仅是校徽,更是办学和育人的价值引领,通过校徽寓意引领校风建设,增进学生民主平等、团体互助的集体生活,去进行创意无限的集体自治、集体探讨和集体创造。<sup>[52]</sup>

### 参考文献:

- [1] 陶行知. 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J]. 新教育,1919,2(02):94-102.
- [2]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25.
- [3] 陈善卿,张炳生,辛国俊. 生活德育论 陶行知德育理论的研究与实践[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06-107.
- [4]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108-109.
- [5]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252.
- [6]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12-13.
- [7]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79.
- [8]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12.
- [9]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293.
- [10]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三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79.
- [11] 张劲夫. 思陶集[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35.
- [12] 熊明安,周洪宇. 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438-439.
- [13] 熊明安,周洪宇. 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438.
- [14] 戴伯韬. 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61.
- [15]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辑. 方与严教育文集:上[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279.
- [16]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141-142.
- [17]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辑. 方与严教育文集:陶行知及其生活教育[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1275.
- [18] 朱泽甫. 陶行知年谱[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224.
- [19] 马侣贤,戴自俺. 工学团业书之一 山海工学团 全1册[M]. 上海:儿童书局,1934:46.
- [20]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10.
- [21]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386.
- [22]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383.
- [23] 何日平. 教学做合一之教科书[J]. 中华教育界,1931,19(04):9-19.
- [24]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331-332.
- [2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暨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104.
- [26]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二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310.
- [27] 陶行知. 天将明之师范学校[J]. 新教育评论,1926,2(21):13-17.
- [28]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四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2):33-35.
- [29] 陶行知. 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J]. 新教育,1919,2(02):201.
- [30] 方明. 陶行知全集 第四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512.
- [31] 俞子夷. 学生自治与学校管理:回忆简录[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01):87-96.
- [32]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八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48.
- [33] 向华. 民国前期学生自治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 [34]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8.
- [35] 李楚材. 破晓[M]. 上海:儿童书局,1932:1.
- [36] 陶行知. 儿童保育问题[J]. 战时教育,1940,5(07):1-2.
- [37] 陶行知,程本海.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J]. 中华教育界,1927,16(10):1-5.
- [38] 周洪宇. 核心素养的中国表述:陶行知的“三力论”和“常能论”[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01):5.

- [39] 方明.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9(02):31.
- [40] 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522.
- [41] 金林祥. 二十世纪陶行知研究[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20.
- [42] 周洪宇. 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第5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21.
- [43] 孙铭勋,戴自俺. 晓庄批判[M]. 上海:儿童书局,1934:86.
- [44] 孙铭勋,戴自俺. 晓庄批判[M]. 上海:儿童书局,1934:88.
- [45] 周洪宇. 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第5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44.
- [46] 古梅. 中国乡村师范演进的鸟瞰:附图、表[J]. 中华教育界,1934(12):1-12.
- [47] 孙铭勋,戴自俺. 晓庄批判[M]. 上海:儿童书局,1934:23.
- [48] 陶行知. 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J]. 中华教育界,1931,19(03):28.
- [49] 陶行知. 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J]. 新教育,1919,2(02):197.
- [50] 陶行知. 我们的校徽[J]. 战时教育,1939(04):3.
- [51] 陶行知. 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J]. 战时教育,1940,6(01):10.
- [52] 陶行知. 育才二周岁之前夜[J]. 战时教育,1941(06):2-7.